

中国近代史学史论集

(上)



中国近代史学史论集
(上)

中国史学研究集刊

吴泽主编 袁英光选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史学研究集刊
中国近代史学史论集(上)

吴 泽 主编

袁英光 选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华 东 师 大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5 字数: 322 千字

印数: 1—2,800本

1984年6月第一版 1984年6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135·009 定价: 2.30 元

前 言

史学史是研究历史学本身发生、发展、变迁、递嬗的一门学科。中国史学史的任务在于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分析和评述古今历史著作，探索和研究我国史学思想的流派、历史编纂学的演变以及史学本身的发展规律。我国早在奴隶社会时，就有了历史记录和历史书籍。进入封建社会后，特别是到了西汉时，司马迁写出了著名的《史记》，提出了对史学的看法，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基础。此后，史学著作繁多，史学日臻发达。事实表明，中国古代传统的史学理论和编纂方法确是极其丰富的，值得我们重新加以发掘、整理，批判地继承和发扬。但是在我们整个的中国史学史中，还必须重视和研究近代输入中国的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和方法，探究它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以及对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当然，我们特别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国史学发展的影响，及其与封建主义史学和资产阶级史学的矛盾斗争等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全面了解与当前史学最有密切联系的近代和现代史学的发展，从而使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真正能促进我国历史科学的研究和发展。

当前，中国史学史还是一门基础比较薄弱的学科，特别是近代和现代史学史的研究工作还刚刚开始。中国进入近代社会后，在史学方面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自龚自珍、魏源到王国维、梁启超等，名家辈出，史著蓰增，为史学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李大钊、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等史学前辈，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国历史，取得了新的巨大成就，写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著作。这些，都有待于我们作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总结。

为了繁荣史学史这块学术园地，我们特约请有关的学者和专业工作者，撰写论文，各抒己见。通过讨论和交流，以便促使史学史这门学科更快、更好的发展。为此，我们在一九七九年曾选编了《中国史学史论集》(一)(二)两辑，其内容为中国古代史学史部分。这一次，我们又选编了《中国近代史学史论集》上、下两册，作为《中国史学史论集》的续编。这些论文除部分已在报刊发表过外，大多数文章还是第一次和读者见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齐思和、吕振羽、顾颉刚等著名史学家，在逝世前夕，为本书撰写文章，精神是感人的，我们谨在这里致以敬意和悼念。

本书在编选过程中，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负责同志和有关编辑的支持和协助，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和提供校阅资料，谨此致谢。

华东师大中国史学研究所史学史研究室
一九八三年四月

目 录

前言

- 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 桂遵义 (1)
- 李大钊对中国史学的巨大贡献 李润苍 (15)
- 中国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
..... 叶桂生 刘茂林 (32)
- 近代史学和儒家经学 汤志钧 (54)
- 龚自珍史学研究 张承宗 (66)
- 魏源的历史变易思想研究 吴 泽 (90)
- 魏源《海国图志》研究 吴 泽 黄丽镛 (128)
- 论“钦定《明史》”的“一统”和魏源对明史学的
贡献 刘寅生 (164)
- 魏源与《圣武记》 袁英光 (180)
- 魏源与《元史新编》 童 浩 (196)
- 关于《道光洋艘征抚记》的作者问题 姚薇元 (222)
- 缪荃孙与清史研究 张承宗 (232)
- 夏燮与《明通鉴》 袁英光 (250)
- 夏燮《中西纪事》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想 司马平 (271)
- 梁廷枏史学研究 胡逢祥 (282)
- 徐薰的封建正统主义史学思想 袁英光 (315)
- 论黄遵宪的史学发展道路 盛邦和 (334)
- 郑观应史学观简论 夏东元 (361)
- 论康有为公羊三世说历史观 吴 泽 (374)
- 试论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 汤志钧 (411)

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

桂 遵 义

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根据历史事实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是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相联系的。本文试图探索“五四”运动前后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演变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过程,是否有当请同志们指正。

一

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奴役压迫下,中华民族陷于黑暗痛苦的深渊。近百年来,广大人民群众不甘忍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剥削,前仆后继,流血牺牲,进行了数十次英勇不屈的斗争。很多先进分子,为了寻找救国真理,致力于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当时的人们把这些学说称之为“西学”或“新学”,以与中国传统的封建“旧学”相区别。“新学”在中国的兴起过程,也就是资产阶级文化和封建地主阶级旧文化的斗争过程。这种“新学”与“旧学”之争,表现在历史学方面,就是资产阶级史学与封建主义史学之争。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以前,二千多年来一直是封建地主阶级史学占统治地位,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翻开一部二十四史,大多是封建帝王的家谱,文臣武将的传记;到处充斥着“三纲五常”、“劝忠教义”的封建道统说教。当然也反映了一些人民性的东

西，值得我们借鉴。封建史家们还在不同程度上而且凭其阶级偏见，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天命论史观。到了宋明时代，且发展为“天理人欲”的天理史观，妄图以此麻痹广大人民群众，使之任凭“天命”的摆布，以此维护其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

到了十九世纪末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初步发展，出现了反映资本主义要求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史学，康有为和梁启超便是改良主义史学的倡导者。康有为以中国古代今文经学的历史变易思想为基础，吸收西方资产阶级的庸俗历史进化论，建立起以“公羊三世说”为主导思想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史学体系。在戊戌变法时期，他著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和《礼运注》等书，宣扬“三世之变”的历史进化思想。又编有《日本明治政变考》、《俄罗斯大彼得政变记》、《法国革命记》，以及《波兰分灭记》等著作，以日、俄、法等国的历史为鉴，劝说光绪皇帝变法，走改良道路。梁启超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史学的集大成者。他明确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新史学”的主张，并对封建主义旧史学展开了猛烈的批判。他的“新史学”理论，集中表现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著作中。在他看来，史学是“国民之明镜也，爱国之心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①因此，他大声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革命遂不可救。”^②可是，他们的“新史学”只讲点滴进化，反对社会革命，是保守的唯心主义史学。戊戌变法失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康梁在政治上堕落为保皇派。其“新史学”也随之逐步堕落为所谓“三世三重”说，失去了它早期的反封建的进步性。

二十世纪初，由于改良主义的破产，地主阶级顽固派气焰嚣张，清廷政权更加腐朽，一九〇〇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接着，在义和团运动的影响和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出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

① 梁启超：《新史学》。

② 同上。

命运动。随着这个运动的兴起，为其政治路线服务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史学也就应运而生。

史学战线上的斗争是政治路线斗争的具体反映。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史学与改良派史学的斗争，主要是围绕着改良还是革命这一中心问题展开的。两派都借助于世界历史的研究，寻找借鉴，为其政治主张提供历史的依据。正是从这一目的要求出发，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法国革命史研究为中心，展开对世界各国革命史的编译研究，先后出版了《法国革命史》、《法国革命战史》和《法国革命史略》等著作。而资产阶级改良派则以日本维新史研究为重点，先后编译出版了《日本维新史》、《日本维新三十年史》和《欧美各国立宪史略》等著作。从史学观点看，似乎这两派都宣传历史进化观点，但两者却有着显著的区别。资产阶级改良派所鼓吹的进化是点点滴滴的进化，主张以改良促进化。而资产阶级革命派则宣传激变，主张以革命促进化，较之前者是前进了一大步。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陈天华，把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史称之为革命史，并与欧洲近代革命相提并论，写成《中国革命史论》一书，充分肯定了社会革命对于推动社会历史进化的意义。他说：“宇内各国，无不准进化之理。其所以雄飞突步，得有今日者，进化为之也，非自古而然，革命亦其一端也。当其更新之际，恐怖革命者，度亦如今世之人，惴惴焉谓将蹈历史之覆辙。……故革命者惟问于世宜不宜，不必复问历史，自我作始可也，苟无创造者，则历史又何从有乎？”又说：“质而言之，革命者，救世之圣药也；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长夜矣。”^①再如汪东的《法国革命史》，据说是受章太炎委托而编写的。因为章太炎认为康有为的文章，“其为进步之梗者，良非鲜浅，不可不有以匡之”^②。当时康有为等改良派攻击革命派说：“倡革命言压制者，已类于无病学呻，此真病狂之言也。”汪东针对此说

① 《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第二一四——二一五页。

② 汪东：《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民报》第十一号。

谓：“今复取当时法国事实，与夫中国之现势，比较论之，所以使躬为革命者，知有所鉴，而复有致疑于革命主义者，亦庶几释然与。”^①

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先天不足，资产阶级革命派史学同改良主义史学一样，在同封建主义史学斗争中是软弱无力的。辛亥革命失败后，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的恶浪。封建卫道者宣扬“发扬国粹，维护国俗，定孔教为国教”。孔教会、孔道会之类组织纷纷出现。在此恶浪前，资产阶级史学止步不前，偃旗息鼓了。曾经积极主张维新变法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此时此刻竟公然以当代孔子自居，主编《不忍杂志》，提倡尊孔读经，宣传封建复古主义；曾经积极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说和历史进化思想的严复，此时此刻则向封建主义妥协，成为复辟帝制的拥护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史学由历史进化论倒退到传统的封建历史循环论。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人物章太炎，在辛亥革命时期曾猛烈批判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和“孔子托古改制说”，主张“骤变”。辛亥革命后，他却“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到晚年也走上尊孔读经的旧路。与之同时，许多人感到彷徨苦闷，找不到出路。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②这就告诉我们，中国资产阶级的思想是无力战胜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历史表明：在民主革命时期，要彻底打败封建主义史学和帝国主义史学的任务历史地落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肩上。

① 汪东：《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见《民报》第十一号。

②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六五七页。

历史的发展是不以反动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辛亥革命后封建主义旧文化向资产阶级新文化进行反扑，在这股反动逆流面前，新文化思想并没有熄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列强无暇东顾，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得以乘隙发展。与此同时，思想界又呈现一派活跃的气氛。当时的急进民主主义者从现实生活中清楚地看到，不彻底铲除封建专制，就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陈独秀说：“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自经此次之实验，国中贤者，宝爱共和之心，因以勃发，厌弃专制之心，因以明确。”^①主张推翻封建主义的专制统治。他们从实际生活中又看到：“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②，清除人们头脑中的封建愚昧，是救国的首要任务。他们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兴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新文化运动，在茫茫黑夜中点燃了启蒙运动的火炬。

十月革命照亮了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李大钊等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热情地向中国人民宣传马克思主义，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与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一系列文章，初步运用唯物史观对法俄两国革命作了比较研究，热情歌颂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充分肯定了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他说：“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主义而并著世界革命之采色者也。”^③他鼓励在黑暗中探索的中国人

①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新青年》一卷六号，一九一六年二月。

② 《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下同）第七五页。

③ 《李大钊选集》，第一〇二页。

民，翘首迎接十月革命的曙光，“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①。他深刻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国际形势，得出了社会主义必胜，资本主义必败的科学结论。并进一步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②。他预见将来的世界，“必是赤旗的世界！”大力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观。

“五四”运动的迅猛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李大钊更加自觉地、系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他在《新青年》等刊物上，相继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和《史观》等文章，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考察中国社会现状，指导历史研究，初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揭开了新篇章。

李大钊首先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基本思想。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一个有机的统一的整体，“完全自成一个有机的有系统的组织，都有不能分离不容割裂的关系”，而阶级斗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③。他在阐述历史唯物论时，着重阐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原理。依据这一原理分析了人类社会由家庭经济变为资本主义经济，由个体劳动变为工场组织的历史演变，指出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因是“物质的生产力”，“生产力一有变动，这社会关系也跟着变动”^④。据此，他强调研究历史不应到人们头脑中去寻找规律

① 《李大钊选集》，第一〇四页。

② 同上书，第一一三页。

③ 同上书，第一七七页。

④ 同上书，第一九〇页。

和结论。明确指出：唯物史观“解释历史的方法不求其原因于心力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因为心的变动常是为物质环境所支配。”^① 这对唯心史观所宣扬的意志决定论是一个有力的批判。

在论证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时，李大钊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产生和发展是与一定的生产发展阶段相联系的。在原始社会，由于“经济上和技术上不发达，一个人的劳动，只能自给，并无余裕，所以不发生阶级”，后来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技术日精，经济上发展日进，一人的劳动渐有余裕。这个余裕就是剩余劳工。剩余劳工，渐次增加，持有生产手段的起来乘机夺权，遂造成阶级对立的社会”^②。阶级斗争只是阶级社会的特有现象，到了生产力非常发展的时候，“与现在的社会组织不相应，最后的阶级斗争，就成了改造社会消灭阶级的最后手段”^③。他确认人类社会的发展，正象马克思所论证的必然经过“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现代资本家的”^④几个社会形态。而且断定“资本家的生产方法，是社会的生产方法中采取敌对形式的最后”一个社会形态，将来，随着无产阶级的壮大，通过阶级斗争消灭资本主义。

李大钊还认为人类社会历史，是生产方式的发展史，即物质生产者的历史。他指出：“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⑤ “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⑥ 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这一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出发，他尖锐地批判了剥削阶级宣扬的帝王将相和上帝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他指出：以往的历史学，“专记述王公世爵纪功耀武

① 《李大钊选集》，第三三七页。

② 同上书，第二二三页。

③ 同上书，第二二三页。

④ 同上书，第一八八页。

⑤ 同上书，第三四〇页。

⑥ 同上书，第一九一页。

的事”，把历史看成是帝王将相家谱和伟人传记史，把特权阶级置于超自然的权力保护之下，把历史作为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①。他对唯心史观的深刻揭露和批判，是其从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史观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标志。也就在这一根本观点上，他和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划清了界限。

李大钊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和《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等论文中，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原理，对有关思想史方面的问题作了唯物主义的回答。他认为道德是一种观念形态，它不是超自然、超物质的东西，不是人们凭空捏造出来的。“也不是神赐的，乃是社会的本能。”^②同样，他根据这一观点来分析研究孔子长期统治人们思想的原因。指出：“孔子的学说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有二千余年的原故。不是他的学说本身具有绝大的权威，永久不变的真理，配作中国人的‘万世师表’，因他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③既然，孔子学说是“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那么，“孔子主义（就是中国人所谓纲常名教）并不是永久不变的真理。孔子或其古人，只是一代哲人，决不是‘万世师表’。”^④到了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大工业的日趋发展，封建社会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面临崩溃和瓦解，孔子的学说也就必然随着农业经济的瓦解而动摇。历史发展到今天，什么“圣贤的经训格言，断断不是万世不变的法则。什么圣道、什么王法、什么纲常、什么名教，都可以随着生活的变动、社会的要求有所变革，而是必然的变革”^⑤。他进而指出，随着新的社会经济势力的兴起，适应它发展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不可抗拒的。他说：即使“有几个尊孔的信徒天天到曲阜去巡礼，天天戴上洪宪衣冠去祭孔，到处建筑些孔教

① 《李大钊选集》，第三三七页。

② 同上书，第二五八页。

③ 同上书，第二九七页。

④ 同上书，第三〇三页。

⑤ 同上书，第二七二页。

堂，到处传布‘子曰’的福音，也断断不能抵住经济变动的势力来维护他那‘万世师表’、‘至圣先师’的威灵了。”^①李大钊从社会经济的发展来研究孔子学说，对当时甚嚣尘上的封建复古论者不仅是一个厉严的批判，而其中某些论述，对于今天我们进一步研究孔子的思想学说也是有参考价值的。

李大钊还以唯物史观作指导，结合地下发掘和古文献开展古史研究，为我们作出了典范。一九二〇年，他在北京大学讲授历史时，作了题为《原人类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的学术报告。这一最早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我国古史的论文，综合研究了地下出土的贝壳和古代传说中的历史，认为“人类最初的家庭是森林，后来遇见了一个冰期，变更了气候，人类遂转徙河岸海滨去”^②。这个论点，后来经过大量的地下发掘和科学鉴定，证明是正确的，符合历史实际的。他又依据地下发掘和古文字的演变，结合伏羲画八卦，“神农结绳为治”等古代传说，认为我国原始社会经过畜牧业经济发展到农业经济阶段，而且经过“女权”（母系社会）的历史阶段。在这篇文章里，他还结合殷墟地下发掘出来的古器物，以及《尚书》、《诗经》等古代文献，研究殷商社会历史及其经济发展情况，从而断定我国殷代“尚为石器时代”，而周代“已入铜器时代了”^③。虽然，他提出的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就其研究方法来说，是力图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

此外，李大钊还于一九二〇年五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五一”运动史》。这是“五四”运动时期最早研究国际工人运动史的代表作。文中简要介绍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历史，高度称赞美国、法国工人阶级为夺取自己权利而进行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并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号召我国无产阶级起来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斗争。

① 《李大钊选集》，第三〇二页。

② 同上书，第三四三页。

③ 同上书，第三四八页。

总之，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初创过程中，李大钊是先驱者。此外，李达、陈望道等老一辈社会科学家在宣传唯物史观等方面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五四”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但毕竟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是值得我们珍惜的。

三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宣传马列主义、捍卫党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的斗争中不断成长，成为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部分。

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这个纲领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中国近代社会，第一次提出了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科学论断。当时，有些人疯狂反对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别有用心地歪曲中国近代历史，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作辩护。他们胡说什么：“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又说谁要宣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就是“乡下人谈海外奇闻”^①。针对这些无耻谰言，党的刊物《向导》、《新青年》等及时发表了瞿秋白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萧楚女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实况》，以及蔡和森的《外国帝国主义与军阀协同压迫革命的真势力》等文章，用铁的事实驳斥了这帮人对中国近代历史的歪曲，捍卫了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这场斗争，直接推动了对中国近百年革命斗争史的研究。如，蔡和森发表的《义和团与国民革命》一文，深刻、系统地分析了产生义和团运动的主要原因，是“对于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直接与间接的）不堪忍受”而引起的。文章还指出：“自外国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来，中国革命已不是单纯的

^① 胡适：《国际的中国》，《胡适文存》第二集，第三卷第一二页。

对待某一朝代某一军阀的内政问题，而是对付国际资本主义野蛮酷烈的侵略问题，而某一朝代某一军阀不过为问题中之一部分。在这一点上，义和团运动是足以代表中国革命之客观的需要与性质的；也只有由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义和团的精神与价值。”^①从而肯定义和团运动是具有反帝反封建性质的农民运动。他又进一步把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作了比较，认为辛亥革命在对待帝国主义态度上存在幻想，“这种非革命性（对于外国帝国主义）的精神与期望，现在已证明其完全错误与无效。”他明确地说：“现在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则不然，他反而成为全世界一切反革命的中坚，尤其是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他必出死力以维持这些地方封建的半封建的旧制度与旧势力，因为这样于他是极有利的。”^②瞿秋白同志在《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一文中，不仅肯定了义和团运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质，而且着重总结了义和团运动失败的历史教训。他总结说：“没有一个先进的有组织力量的阶级做主干”，因此，“不能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和阶级觉悟”，“所想的是狭义的民族主义及国家主义”。于是，“这壮烈的反抗侵略的运动，便以迷信的、拚命的、无希望的原始暴动结局了”^③。他联系当时的革命斗争，教育中国人民，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克服那种“狭义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为实现党的民主革命纲领而英勇战斗。

在党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的号召下，汹涌澎湃的工农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发展起来，它的兴起，给历史科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新的任务。我们党的领导同志不仅直接参加和领导了工农运动，而且亲自组织编写出我国第一批反映工农革命斗争史的历史著作。一九二二年，在党的领导下，安源路矿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为了总结安源工人斗争的经验，编写了《安源路矿俱乐部略史》。继安源工人罢工斗争后，湖南水口山铅锌矿工

① 《向导》第八一期。

② 同上。

③ 《向导》第一二八期。